

政治抑或学术:梁启超对严复之批评

任雪山

(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梁启超和严复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深有影响的人物,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戊戌变法之前,流亡日本期间,放弃政治生涯之际和严复去世以后。批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成一家之言”,一是言辞“太务渊雅”。总体评价可谓不低,但着墨委实偏少。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恩怨以外,还与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术理念不同有关。

[关键词]梁启超;严复;学术批评;一家之言;渊雅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6-0081-05

Political or Academic: Liang Qichao's Criticism of Yan Fu

REN Xues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 and Yan Fu are both deep influential figures in Chinese modern thought and cultural history. Liang Qichao's criticism of Yan Fu has obvious emotional color.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before the Wuxu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e period of exile in Japan, after the abandonment of the political career and after the death of Yan Fu. Criticism mainly includes two aspects: one is "Into the statements of a School" of the translation, the other is "Over-Quaint". The overall evaluation is not very low, but too little writing. To investigate its reason, besides their personal resentment,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ir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concepts.

Key words: Liang Qichao; Yan Fu; academic criticism; statements of a School; quaint

梁启超和严复,都是清末民初文化舞台上深有影响的人物。章士钊晚年回忆道:“从晚清以至民初,二三十年间,以文字摭写政治,跳荡于文坛,力挈天下而趋者,唯严几道与梁任公二人。”^[1]1896年梁启超赴上海办《时务报》期间,经马建忠兄弟介绍,结识严复。梁氏小严复近20岁,严复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张灏说:“梁对西方进步思想的兴趣必须追溯到他流亡前的几年里。在那段时期,主要通过康有为和严复的影响。”^[2]史华慈说:“严复对于梁启超后来发展的影响远比他的老师康有为对他

的影响深刻。”^[3]既然严复对梁启超影响如此重要,那么他是如何评价严复的呢?纵观梁氏一生,著述达1400余万字,专门涉及严复的仅有一篇,即:光绪23年(1897)所写的《与严幼陵先生书》,清代学术史和其他报刊文章虽也有提及且评价不低,但着墨委实偏少,个中缘由令人深思。概而言之,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戊戌变法之前。1896年,梁启超在

收稿日期:2015-10-1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社科重点基地项目(SK2015A163)

作者简介:任雪山(1976-),男,安徽泗县人,合肥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清代文学。

上海开办《时务报》,严复极为赞叹,并捐助百元以示祝贺。^{[4]505}但此后不久,严复觉得梁氏心浮气躁,便修书直言批评。这封信让梁启超颇伤脑筋,几个月后才予以回复,即1897年的《与严幼陵先生书》。该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办报之意;二是变法之难;三是古议院考;五是保教问题。总体来看,梁启超主要是正面回应严复的批驳,且力陈己见。既不卑不亢,亦不失礼貌,正如信函开头所言:“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5]71}虽是客套话,听起来依然充满感情。这封信稍后,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及此事:“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欲质之先生,其词太长,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续陈。”^[6]结合两封信可知,梁启超当时对严复评价颇高,且尊敬有加,毕竟他只是20多岁刚出茅庐的小伙子,严复已声名远播。

第二阶段,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鼓吹维新运动,影响力愈大。虽然严复时有批评,他却并不恼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号《介绍新著》栏目介绍严复翻译的《原富》、谭嗣同的《仁学》和他自己的《李鸿章》,并把《原富》放在第一个,足见彼时严复及其译书的地位。梁启超对《原富》的评价涉及正反两个方面,涵盖该书内容与形式。在翻译形式方面,梁氏认为严复借鉴中国传统注疏方式,“于翻译之外,常自加案语甚多。大率以最新之学理,补证斯密之所不逮也”。而其效果可以“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在具体名词术语的选择上,严复也能够“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能够如此贯通古今中西,且为后人师,梁启超盛赞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当然此书并非没有遗憾:“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7]此后不久,梁启超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中国最近世之学术,再评严复:“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

界。十年来思想之不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5]619}不难看出,此阶段梁启超对严复有批有评,肯定多于否定,总体评价较高。

第三阶段,放弃政治生涯之际。1920年初,梁启超离开政治舞台,全力从事教育事业。虽然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他肯定了严复的信达雅三义,但在其学术史名著《清代学术概论》里,对严复的翻译成就评价过低,其他学问更是只字不提:“时独有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5]3105}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眼里,严复的成就只是翻译几本过时的书。最多只能够在普遍令人不满的留学生中居首,根本与清代学术没有衔接,而对于严译诸书在社会的巨大影响,不着一墨。这是公开评价严复最低的一次,把严复降到普通留学生的水平。且在论述篇幅安排上,也明显偏少。在该书中,他论康有为和他自己都用了两节内容,论述谭嗣同和章太炎也都是完整一节,到严复仅一句。这种明显淡化严复的做法,可以说是梁氏对严复长期批评他的一个正式而文雅的回答。严复确实有自己的问题,可梁启超的做法与评价与严复的地位实不匹配,与梁启超在其他时期的评价不合,也与事实不符。

第四阶段,严复去世之后。1922年梁启超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以进化论为原则把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并认为这一时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作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5]4030-4031}随后在1923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谈到清末新思想运动时,再次将严复与其本人和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同列并置,提出四大潮流,即:梁启超自己和他的朋友、章太炎、严又陵、孙逸仙。在具体论严复时,他说:“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5]4442}应该说,这一阶段,梁启超对严复的评价相对客观,给予其很高地位,把严复和他本人一起放在思想第一方阵,引领时代潮流,兼通中西,能够“成一家之言”。但是也应该看到,梁启超在严复身上着墨依然不多。此后,梁

启超再未公开评论过严复之学。其实,即便是之前严复 1921 年的去世,梁亦只字未提。

从以上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严复的评价虽有反复且带有鲜明的个人感情,但总体评价不低,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过他几乎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过严复的学问,好像严氏徒有其名。某种程度上,梁启超评价严复,只是因为那一段历史实在无法绕开严复,不得不评,评又不太情愿,只好尽量节省笔墨。概而言之,梁氏对严复的评价,虽涉及很多方面,主要还是体现在翻译言辞上,这也是后来引起颇多论争的问题。从正面来说,认为其翻译“成一家之言”;从反面来说,认为其言辞“太务渊雅”,而严复“一家之言”的最大特点就是“渊雅”。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是否公允,这是我们要弄清楚的。

二

严复的翻译能否“成一家之言”,基本没有什么异议。康有为评价当年的翻译界说“译才并世数严林”。^[8]黄遵宪盛赞严复为学界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4]1572}蔡元培认为彼时介绍西洋哲学“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的译词“物竞”“争存”“优胜劣汰”等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9]351-352}胡适评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10]211}从他的《天演论》以后,中国学者才知道西洋除了枪炮之外,还有如此精到的哲学思想。就连他的名字也是源于《天演论》之“适者生存”。^{[10]70}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11]1}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11]7}吴汝纶高度称赞严复:“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12]柳诒徵说:“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13]888}能够得到各方人士的肯定,实属不易,严复在晚清民初翻译界地位,可谓举世公认。而他翻译的明显特征就是,以渊雅古文译西书。与林纾不同的是,他的翻译以哲学社科类为主,林译以文学类为主,他们可谓在各自领域成就一家之言。

当年翻译西书,可选择的文辞有四种:八股文、骈文、古文和白话文,严复最终使用了桐城派古文,并取得了成功,但梁启超批评其“太务渊雅”。“渊雅”到什么程度,不妨看看其他人的看法。吴汝纶认为严译《天演论》“惠书词义深懿,有合于《小雅》怨诽之旨”,^{[4]1560}又言其文“駉駉与晚周诸子相上下”。^[12]贺麟读说严复译书“俨有读先秦子书的风

味。”^{[14]82}柳诒徵说严复的译文:“悉本信雅达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者相颉颃”。^{[13]888}黄遵宪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的读后感:“《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4]1571}可见,“渊雅”实在是严复给时人的普遍印象,而非梁启超一人感觉。问题关键是,严复译文是否“太务渊雅”。

贺麟认为严复的译文“很尔雅,有文学价值,是人人所公认无有异议的”,“严译虽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但能使旧文人看明瞭,合于达的标准,这也是无人否认的”。^{[14]81}王佐良细致分析了雅,认为严复的“雅”与“信”是紧密相连的,雅不是美化,而是一种努力,“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的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15]26}而之所以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主要是吸引当时士大夫们的注意,因为只有他们引领中国的变革。而士大夫们的改变,又要通过思想意识的改变来实现,所以严复有选择的翻译了西方的一批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他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比人们所承认的要深得多,他想通过翻译达到的目的也比人们所觉察的要大得多。”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睡在中古梦里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15]27}只有古雅,才是当时知识阶层普遍接受的语体风格。

胡适对严复的古文译西书表示理解,他说:“当时自然不便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适用。所以严复译书的文体,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10]212}他认为严复的翻译在古文学史上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这种文字,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怪不得严译的书风行二十年了。”^{[10]213}但是,以新文学标准来衡量,情形就不一样了。胡适认为:“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10]201}在胡适看来,只有白话文是最适合应用的,而此前的古文字是僵死的文字,古文学也是“死文学”或“半死文学”。胡先啸认为文言与白话之别不在古今,而在雅俗,所以典雅的古文也可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绝非胡适所谓的“死文字”。他特别欣赏严复:“以不刊之文,译不刊之书,不但其一人独自擅场,要为

从事翻译事业者永久之模范也。”^[16]

张君勱对严复大加赞赏,认为其“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洋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于独创。译名如‘物竞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但他也指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往往以古今惯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意转歧混。”^[17]接着他还举《天演论》之例进行说明。张君勱看到了严复译文的价值与意义,但是没有把严复译词放在当年的特定环境来理解,严复所处时代的读者与张已有很大不同,严复的译词恰恰是为了满足当时读者的口味。蔡元培看到了严复的良苦用心,他说:“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来,或稍嫌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的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10]351-352}

吴汝纶和黄遵宪都是严复与梁启超的朋友,他们都欣赏严复渊雅的古文,但也有自己不同的意见。吴汝纶认为渊雅之时,应该尊重原著,不能随意更改:“若以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4]1560}这实际涉及雅与信、达之间的关系。黄遵宪持论颇为中立,首先他认为不同文本应该采用不同语言,像《名学》这样的著作不用艰深之文不足以发其蕴,而《原富》这样的书以流畅文笔未尝不可。其次,古文之勉强可以表达古代,表达今天则不足,表达西方更是不够,所以黄氏提议通过造新字和变文体来解决。最后,文界可谓无革命,但要有维新。^{[4]1571-1573}某种程度上,黄的理解要更客观科学,也更符合文字本身发展逻辑和当时社会实际。真正的批评来自王国维,他认为严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18]王国维认为严译缺少精确度,不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这样一来,失去了信,只剩下古雅了。

三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严复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词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且两者关系成正比,“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韩愈

的文字最为优美,所以他用古文翻译西书,并非一味渊雅,而是为了文章本身的需要,“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4]516}若要改变时代社会风貌,就必须采用符合当时读书人习惯的语言,那些鄙俗之词对文界相当于凌迟,而不是什么文界革命。况且他的翻译本来就不是给学童看的,而是给读古书的知识阶层看的,“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贻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4]516-517}严译的目的显然与梁启超面向大众的报章新民体不同,虽然严梁都有社会启蒙革新之宏愿,但一个是寄希望于知识阶层,一是寄希望于广大的民众。后来张法把他们的不同归结为“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并引用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里的话来说明两者差别:“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5]109}他认为,严复的传世与梁启超的觉世,包含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目标读者是精英士大夫还是广大读者,二是时间效果是长远流传还是当下功效,三是文章性质是把中国性(古雅)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世界性的(通俗)放在第一位。^[19]从当代眼光来看,严复传世之文在后世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而梁启超的觉世之文传至今日,依然吸引众多读者,且令人心潮澎湃。

除了上述原因,严复要求译词尔雅,而不鄙俗,还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尤其是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对严复发生直接影响。严复翻译时,曾经多次向吴汝纶求教,并虚心接受吴的建议。两人专门谈论过尔雅的问题,吴汝纶说:“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欲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20]雅洁是桐城派文论的基本主张,由方苞首倡。如果说雅是一种古,那么洁则是一种简,所谓“清真古雅”。方苞的“雅”主要是指文辞的妥帖雅驯、不俗不俚。如果行文引喻凡猥、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都属不雅的范围,应当予以避免。方苞曾对门人沈廷芳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21]方苞针对于此提出雅驯的标准,认为古文不可采用语录语、佻巧语、

佛氏语、隽语、藻俚俚语,因其皆有悖于质而不芜的单行古文特征。将此类语言摒弃于古文之外,恢复其温文尔雅、远离鄙俗的语言本色,既是方苞以古雅论文的意旨所在,也可以说是他对古文文体的一种约定,为后来的桐城派诸家普遍恪守。严复翻译三原则之一的雅,可以说是在翻译领域对桐城派古文的承接和延展。当然,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总是和思想相连,言辞的古雅也正是其思想传统的真实表现,虽然严复到西方留学,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但是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学者,按照当时形象的说法,叫老新党,以新知识武装起来的老派人物,严复在戊戌政变之后政治上的渐趋保守就是最好的证明。

综上所述,各家意见纷呈,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严复以渊雅古文译西书的不同意见,他们基本认可严复的翻译成就,同时看到其不足,而主要的不足就是梁启超批评的渊雅。梁氏对严复的批评,甚至长期的有意淡化,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个人原因,郭双林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梁启超和严复在某些学术和政治问题上的见解不同。二是严复多次对梁启超进行批判指责,虽然是私下,但在友人圈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三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上,两人严重对立。^[22]当然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密切,梁启超夙不喜欢桐城派,这也是原因之一。刘梦溪从学术统系的角度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他把晚清新学划分为两个谱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梁为翘楚;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代表,“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23]两者流派不同,目标不同,看法也自然不同。佐藤一郎说:“梁启超不是把他当作桐城派系统的古文家,而是当作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来看待的。”^[24]严复开始确实是很新的,但后来逐渐变得不新了,他嫌康梁的变法太激进,支持复辟帝制,抨击辛亥革命,反对民主共和,甚至否定向西方学习,肯定尊孔读经,完全将之前推崇的自由、民主抛诸脑后,背离了他早年热情信仰过、传播过的西学和新学,用李泽厚的话说是:“完全回到传统怀抱中去了。”^[25]所以梁启超批评严复是有其充分理由的,除了个人恩怨以外,还有深远的学术背景和政治动因。

参考文献:

- [1] 章士钊. 柳文指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71:2118.
- [2] 张 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21.
- [3] 史华慈. 严复与西方[M]. 叶凤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76-77.
- [4] 王 棫. 严复集(3)[M]. 北京:中华书局,1896:505.
- [5]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6] 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77.
- [7] 梁启超. 介绍新书·原富[N]. 新民丛报:1902(1):113-115.
- [8] 康有为. 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J]. 庸言,1913,1(7):1.
- [9] 高平叔. 蔡元培文集:4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1] 胡汉民. 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J]. 民报,1905(2):249-250.
- [12] 吴汝纶. 天演论·序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
- [13]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4] 贺 麟. 严复的翻译[J]. 东方杂志,1925,22(21):79-81.
- [15] 王佐良. 严复的用心[M]//王棫,王佐奶,贺 麟,等.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6] 胡先骕. 说胡适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J]. 学衡,1923(18):7.
- [17] 张嘉森. 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G]//申报馆. 最近之五十年. 上海:申报馆,1923:68.
- [18]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3册[M]. 姚淦铭,王 燕,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43.
- [19] 张 法. 严复哲学译词:特征与命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02):116.
- [20] 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3[M]. 施培毅,徐寿凯,校. 合肥:黄山书社,2002:235.
- [21] 方 苞. 方苞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90.
- [22] 郭双林.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J]. 史学理论研究,2011(2):84-86.
- [23] 刘梦溪. 晚清新学叙论[J]. 江西社会科学,2004(1):96.
- [24] 佐藤一郎. 中国文章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36.
- [25]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91.